



香港亞太研究所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30.00
ISBN 962-441-046-1

政綱與選舉

一九九四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的 迴歸分析

孫同文
王家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政綱與選舉

一九九四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的迴歸分析

孫同文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政綱與選舉

一九九四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的迴歸分析

作者簡介

孫同文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摘要

「政策取向」對於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一直是選舉研究的焦點，但是，在競選的雙向政治溝通過程中佔主導地位的候選人，如何設計政綱以贏取選舉則比較少為學者所關注。本文的分析架構強調候選人是具有「策略眼光的競選者」，他們利用競選政綱的「引爆作用」，將候選人的政策立場與個人形象相互結合，從而激起選民的認同而贏得選舉。香港一九九四年區議會選舉的實證資料顯示，政綱有地區和選區的差異性，而當選者較落選者傾向強調相對具體可行的政策。運用迴歸分析的結果亦指出，除了「選區候選人數」和「現任議員」這兩項因素之外，各選區因其環境的迥異，不同的政綱指標在候選人得票率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九四年區議會選舉

經過激烈的選戰，香港選民已經在一九九四年九月十八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中，順利地選出了 346 位區議員。九四年區議會選舉象徵了香港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首先，此次選舉是第一次以單議席單票制全面直接選舉代議

© 孫同文 王家英 1995

ISBN 962-441-046-1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士，以往的委任議席全部被取消。其次，選民年齡從 21 歲降低到 18 歲，擴大了選民基礎。此外，新任區議員將會組成「九五選舉委員會」，選出十位下屆立法局議員。換言之，是次區議會選舉的結果亦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九五年立法局選舉的形勢。可慮的是，由於中國政府不承認港督彭定康的政治改革和此政治改革所產生的三級議會，甫當選區議員的任期（連同今年三月已選出的市政／區域市政局議員和即將於今年九月選出的立法局議員），只能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底為止。儘管在面臨九七年沒有「直通車」的實際狀況下，346 個區議會席位還是吸引了 757 位候選人角逐。香港各個政黨和政治團體，不論其政治立場，也都積極的推派黨員或盟友參選，其意義值得深入研究。

許多政治評論認為九四年區議會選舉是香港政黨政治發展的第一次面臨考驗（《快報》，1994.8.1；《經濟日報》，1994.8.2；1994.8.4）。眾所周知，政黨是以贏取選舉為目的，各個政黨的積極參選，除了有檢視近年來推展黨務成效之意圖外，更懷有鞏固基礎、拓展勢力的目的。就實際政治運作而論，由於取消了傾向維護政府政策的委任議席，民選議員從此可以真正地發揮區議會監督地方施政的功能。獲得多數席位的政黨，更可以主動的通過議案，向政府施加壓力（《經濟日報》，1994.8.2）。從日後的政治發展看，各個政黨如果在區議會中囊括的席次愈多，其在「九五選舉委員會」選出的十位立法局議席所佔的比例便愈高，從而在未來中央層次的影響力也愈大。更重要的是，此次選舉亦延續了香港政治發展獨特的歷史結構制約：「民主派」、「親中派」及其他政治勢力，均為其未來（特別是九七年之後）的發展爭取有利的位置和更大的空間（王家英，1995：4-6）。¹

總而言之，此次選舉結果不僅反映出不同政黨在各選區的實力，對瞭解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以至日後「港人治港」的政治生態均有一定的幫助。

雖然九四年區議會選舉是香港政黨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但政黨卻不一定是九四年區議會選舉中選民投票時的最重要指標（即所謂的「政黨效應」）。其論點主要有三：

（一）香港各個政黨成立的歷史短，黨員人數少。雖然某些政治團體在草根階層經營多年（如民主民生協進會），但是有區域的局限性，影響力無法遍及香港全體（劉兆佳，1993）。²簡言之，是次選舉毋寧是政黨自我推銷以強化選民認識多於選民向政黨輸忠表誠的契機。（二）區議會本身為一諮詢機構，僅能就影響區內居民的事務和問題向政府提供意見，並直接監督政府服務的情況（Miners，1991：171-174；張炳良，1989：57）。競選勝負的關鍵可能在於候選人確實瞭解區內選民的問題和需要，並且能提出有效可行的解決方法。（三）在上述兩者的交互影響之下，加上香港選民長期以來對政黨多持懷疑的態度（劉兆佳，1993），許多候選人刻意淡化甚至隱藏其政黨色彩，³這種現象在鄉郊和離島選區尤為顯著（《香港聯合報》，1994.9.14）。

根據九四年區議會選舉前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⁴只有 18% 的受訪者認為候選人的「政黨屬性」是他們投票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與「候選人形象」一樣（18%），遠遠落後於「候選人政綱」（64%）的重要性。而在選後不久的另一項民意調查中，⁵在宣稱已投票的受訪者當中，只有 10% 是依據候選人的「政黨屬性」來決定投票取向，遠低於「政綱」（29%）和候選人的「個人特質」（54%）。這兩項民意調查除了說明「政黨效應」在九四年區議會選舉中的重要性

可能比預期的為低之外，更凸顯出「候選人政綱」在選民投票時所扮演的關鍵角色。⁶

本文的基本假設是，候選人是具有「策略眼光的競選者」(strategic politician) (Jacobson and Kernell, 1983)。他們除了考慮要不要參與競選，在那個地區出選，和在何時宣佈參選之外，也注重以何種方式來吸引選民，以達到克敵致勝的目的。換言之，候選人所提出的「政綱」，應是經過策略性選擇的結果。本文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將九四年區議會候選人的政綱，依地區和選舉結果加以闡述和進行比較分析，並嘗試以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的方法，來解釋「政綱」與候選人得票率之間的關係。

政策取向、政黨屬性、候選人評價

投票行為研究一直著重於界定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主要因素和這些因素之間的關係，以及比較它們對個人投票行為的相對重要性。就研究投票行為的理論架構發展而言，可以粗略分為「消費者模式」、「社會背景模式」、「社會——心理模式」和「理性模式」四大類(Niemi and Weisberg, 1984:9-14)。根據Niemi和Weisberg(1984:9-12)的說法，「消費者模式」一味強調選民(消費者)在競選期間依據政黨所推出的候選人(產品)而做出的選擇，忽略了不少的選民在競選開始之前就早已決定投票的事實。更清楚的說，選民本身的投票傾向有其一定的自主性和不變性，對候選人作為一種產品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另一方面，儘管「社會背景模式」具體地描述出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選民的

投票傾向，但無法提出適當的解釋原因。因此，這兩種理論架構大抵已經被後來的學者揚棄或超越了。

事實上，自從Campbell等學者發表*The Voter Decides* (1954)以降，「社會——心理模式」所主張的「政黨屬性」、「政策取向」和「候選人評價」這三個變項，一直是學者所共同接受為影響選民投票決定的最重要因素，儘管對於這三者之間的交互關係與它們對投票行為的相對影響力，迄今仍無法達成共識。

在早期Campbell等學者的經典著作*The American Voter* (1960)中，選民的「政黨屬性」被認為是決定其投票行為的長期穩定因素，因為「政黨屬性」是在成長過程當中，受社會經濟背景和政治社會化影響而很早形成的。個人的「政策取向」(即選民會選擇政綱與自己政策取向相近的候選人)和對候選人的評價都是短期的、易被動搖的因素，而且受到「政黨屬性」的影響。許多類似此種定向(recursive)模式的投票行為研究均顯示，無論在單次選舉或多次選舉的縱貫分析中，「政黨屬性」對個人投票行為的影響力都是最大的，「政策取向」都是最小的(Goldberg, 1966; Hartwig et al., 1980)。

然而，這種定向模式的結論後來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Brody和Page(1972)就認為，這三個因素的關係應是對等的(reciprocal)。在非定向(nonrecursive)模式的假設下，Jackson(1975)主張選民對政策的考慮是決定其政黨屬性的基礎，如果個人的政策立場改變，或是新興起的問題導致舊有政黨政策的不一致性，選民便可能轉投他黨。Page和Jones(1979)也以實證資料顯示，「政策取向」和「候選人評價」是交互影響的，而這兩個因素又一齊決定了選民個人的

「政黨屬性」。Fiorina (1981) 更進一步認為，所謂「政黨屬性」，實際上是選民對於政黨過去在各項政策上的表現所累積的總評分。挑戰這種說法者則認為，「政黨屬性」本身有其特殊的代表意涵 (Niemi and Weisberg, 1984)，同時也直接影響了投票者的決定和對「候選人評價」 (Whiteley, 1988)。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承認，「政黨屬性」是不穩定的，可能會隨著社會的改變而波動 (Whiteley, 1988)。

另一方面，Markus 和 Converse (1979) 強調，「候選人評價」是「政策取向」、「政黨屬性」和「候選人個人特質」三者交互影響的結果，但只有前者直接與投票行為有關。許多研究也支持這個論點 (Kessel, 1980; Miller et al., 1986)，並進一步認為選民對候選人的評價著重於對候選人個人特質的喜好，而非基於對其所提出政策的贊成與否。但是 Asher (1983:351) 很謹慎的指出，「政策取向」和「候選人評價」在概念上重疊，不容易界定清楚。在測量和統計方法上急於凸顯「候選人評價」對投票行為的影響，可能要付出忽略了「政策取向」的代價。由於概念上的重疊，候選人利用策略性的選擇在某些政策上的立場，以強化其個人特質的說法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例如 Jacobs 和 Shapiro (1994:528) 以美國甘迺迪總統在一九六零年總統選舉時所採取的策略為例，提出了候選人可以透過「引爆作用」 (priming)，經由表明其在某些政策上的意見，以達到集中選民注意力，和藉此釐清選民在評價候選人時所採用的角度。

投票行為研究的另一個理論架構——「理性模式」，強調選民是在理性的基礎上來決定是否投票和選擇候選人。在成本和預期效益的比較之下，選民會傾向選擇能提供最大預

期純利益的候選人，其具體的表現就是投給在政策上立場與自己最相近的候選人 (Downs, 1957; Niemi and Weisberg, 1984:14)。這種理性的、政策取向的投票研究，自從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Nie et al., 1976) 一書發表之後，日益受到重視。選民運用其他因素來做投票的標準，絕非是不理性的。前述的文獻探討除了簡單闡明「政策取向」、「政黨屬性」和「候選人評價」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之外，討論的架構也旨在說明後二者與前者的關連性。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種關連性的存在，也說明了運用其他因素作為投票的準則具有相當程度的理性抉擇。正如同 Niemi 和 Weisberg (1984:14) 所宣稱的：「學者不再是簡單地探索選民究竟是在『政黨屬性』還是在『政策取向』的基礎之上做出決定的。在瞭解每一個因素在某些時候可能具有決定性的解釋原因時，我們所想要知道的是在什麼情況下，某一個因素是最重要的。」

雖然「政策取向」、「政黨屬性」和「候選人評價」在概念上可能重疊而無法確實區分，選擇「政策取向」作為分析九四年香港區議會選舉的切入角度，有其客觀的必要性。如前所述，由於香港政黨或政治團體的發展歷史短，許多選民並不容易也不可能有足夠的政治社會化對某一個政黨產生起碼的認同 (Louie, 1993)，導致了所謂「政黨效應」在此次選舉中的影響相對地減低了。⁷ 此外，也正由於歷史短，人才培訓導管尚未建立，在面臨所有區議會議席全面直選而又希望擴大地區基礎的情況下，各個政黨都大量的徵召新人參選，或是鼓勵資深人士放棄地區優勢，轉投新區擴展。雖然許多新人都有多年基層服務的資歷，但是在政界上仍屬生手。除了少數具全港知名度的人士之外，初投新區者對該地

區的服務多是一片空白。因此，若不倚靠政綱，選民對於這兩種類型的候選人很難予以適當的評價。

Yeung (1992) 在研究一九九一年香港立法局選舉時指出，「政策取向」的重要性應是落後於對候選人過去服務的成績和服務的熱心等個人因素。Kwok 和 Chan (1992) 也認為沒有確實的資料能證明香港選民有依「政策取向」而投票的傾向。但是，多次區議會選舉有關選民的民意調查顯示，選民非常強調政綱的重要性。⁸ 九四年區議會選舉也不例外，據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九四年六月針對年青選民所做的一份民意調查指出，42% 的受訪者認為候選人的政綱和政見是他們投票的準則，遠遠超過對候選人過往工作表現評價的重要性 (32%)⁹ (鍾庭耀，1994)。

分析架構

政治行動者（包括選民與候選人）是理性的，他們會在政治行動的過程中，對主客雙方作出不斷的評估，以求找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選擇 (Green and Shapiro, 1994:14-17)。那些有志於經過選舉過程而發展個人政治事業者，亦應是謀定而後動，在衡量主客觀情勢之後，做出應否競選和如何競選的策略性決定。在應否競選的層次上，潛在候選人主要是考慮機會結構 (opportunity structure) 和政治資源 (political resources) 這兩個因素 (Jacobson and Kernell, 1983:19-48; Born, 1986; Wright and Berkman, 1986; Jacobs and Shapiro, 1994)。在香港的政治制度之下，機會結構最主要是反映在三級議會的問政角色、地位和範圍。首先，從有強烈地方色

彩的區議員，到範圍較大的市政／區域市政局議員，再到類似中央層面的立法局議員，這過程本身便是一條層層遞進的政治梯階。其次，在上述政治事業發展進階的過程之中，還有各種各樣的選舉渠道（如由功能組別、直接選舉，或是區議員組成的「九五選舉委員會」所選出的立法局議員），供有志從政者選擇。當然，機會結構的選擇是受到政治資源所限制的。潛在候選人需要考慮競選經費、個人的知名度和過往表現、實際參與競選的選區、潛在對手的實力，以及宏觀的政治情勢（如中英、中港關係）等問題，才能比較具體地評估是否有贏得勝利的把握。潛在候選人的政治資源評估和機會結構的選擇必須配合一致，空有高階問政的雄心而無實際充裕的政治資源支持的決定，往往是空費氣力、徒勞無功的，而以充裕的政治資源一搏垂手可得的議席，又常令人有保守不前、缺乏進取的非議。

一旦決定參選，候選人必須擬定如何贏取選舉勝利的策略。Asher (1983:364-365) 很清楚的指出，在進行投票行為的研究時，學者往往忽略了選舉乃是一個實際政治運作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候選人透過競選 (campaign)，將自己的優點和所代表的價值體系推銷給選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候選人是主動的，而選民是被動的，只能就現有的選擇中做出決定。不過，所謂被動，畢竟是相對的，因為候選人必須充份評估選民的「理性需要」，而這「理性需要」，正是選民在選舉過程中「反客為主」的主動出擊 (Przeworski, 1991:20)。於是，在選舉的過程中，關鍵在於候選人如何發掘選民的需要，從而具策略眼光地界定自己的競選策略以吸引選民。本文強調的是，在香港政黨政治尚未健全發展之際 (劉兆佳，1993)，而且九四年選舉本身又只是低層次的地

區性選舉，再加上選民傾向於依據候選人政綱為投票標準等數重因素考慮下，候選人策略性的選擇政綱作為向選民訴求其政治理念的重點，藉此推銷自己，贏取選舉，應是合乎理性的。

從傳統民主政治對於代議士與選民之間的關係而言，候選人代表的是不同政策的代理人，選民透過選舉而表達他們對於政府政策取捨和施政方向的意願。理性的選民自然希望能選出政治理念上最足以代表自己，或是問政上能切實體會和反應地方最需要關注事項的代議士。就候選人爭取贏得選舉的考慮來看，並非所有的事，無關大小，都需要在政綱中表達自己的意見和立場。候選人必須謹慎地選擇某些具體可行的政策或地區內所關注的事項來凸顯自己的形象和問政能力，此即所謂「引爆作用」。如同 Jacobs and Shapiro (1994:529) 所言：

當〔候選人〕採取引爆策略時，其競選會有限度地選擇一套大家歡迎而本身立場鮮明的政綱。這些政見並不是競選策略的全部，更不具有排他性，它們成為一種工具，用來強調從而影響選民評估候選人個人特質的標準。……這種以候選人為主體的競選策略涉及策略性的調適：藉由增加候選人政見的頻率、強度和包涵度以凸顯那些精挑細選的少數政綱。

「引爆作用」將候選人的政策立場及個人形象相互結合，從而激起選民的認同，達到當選的目的。採用以候選人策略性的選擇政見，擬定政綱以達到吸引選民的目的，正是本文的分析架構的核心，而此分析架構主要建基於三個有關「政策取向」研究之論點。

第一，真正的「政策取向」投票是選民先有確定的政策立場，從而投票給與自己立場最相近的候選人，絕非「投射」(projection)和「說服」(persuasion)效果的決定。所謂「投射效果」是指選民先決定了喜好的候選人，然後假設他／她贊同自己的政策立場；而「說服效果」也是選民早已決定投給那一位候選人，然後修改自己的政策立場，使之與候選人的立場一致(Niemi and Weisberg, 1984:93)。後兩者所展現的「政策取向」與投票之間的關係，僅是假象而已。

第二，研究「政策取向」的學者強調，選民的決定可以是回溯性(retrospective)或是前瞻性(prospective)。根據 Fiorina (1981) 的解釋，回溯性是指選民依據候選人或政黨在過去表現而投票，而前瞻性則是指選民針對候選人或政黨對於未來政策規劃意見的喜好程度來選擇候選人。本文比較強調回溯性的政策取向投票，原因包括：(一)如 Fiorina (1981) 所宣稱，政黨屬性應是選民對該黨在過去所有政策上所持立場的總評分。縱然香港政黨政治的發展歷史甚短，但政黨之間還是有其獨特迥異的政策取向，而它們的成員過去在各項政策上的推動及監督政府的工作表現，亦或多或少、或好或壞地在不同選區的選民心中留下印象；(二)囿於一九九七年回歸的限制，對於未來的規劃勢必受到政權轉移的衝擊而顯得模糊不清；和(三)九四年區議會選舉的層次較低，其本身的職責亦僅是諮詢機構，對於整體政策規劃的影響相對降低。候選人所提出的政綱，相信是為營造出有能力提供選民最好和最可行的區議員服務方法，而所強調的大多局限於與各個選區息息相關的議題。

第三，「政策取向」的投票行為研究與對選民的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和政治熟練程度(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的假設，有相當重要的關連性。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選民可以接觸的政治消息是數量龐大的，但對政策或候選人的評估，主要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從記憶中存取資料和不斷的更新資訊 (Krosnick and Kinder, 1990; Jacobs and Shapiro, 1994)。再者，理性精準的「政策取向」投票，應該和選民對政治的興趣程度、敏感程度與瞭解程度有關 (Carmines and Stimson, 1980; Rabinowitz et al., 1982)。本文強調，在候選人自覺的控制下，有選擇性地發出的消息（例如政綱、海報、新聞等），都是為了凸顯候選人的競選策略。這種以候選人為中心、回溯性「政策取向」投票行為研究的分析架構，對於選民認知能力和對政策問題熟悉程度的要求應是最低的 (Rahn et al., 1994:194)。而在候選人企圖以「引爆作用」來誘導選民僅就有限度的政策範圍上來衡量和比較候選人，或是強化候選人的形象，或是回溯性的評估候選人過往的工作表現的基本假設之下，大量有關各項政府政策、社會問題和候選人本身的資料訊息，就相對地顯得不重要了。這個基本假設也相當程度地符合了香港居民對政治冷漠和缺乏認識的實際態度 (劉兆佳，1993：58，359-360；鄭宇碩，1995；雷競璇、尹寶珊，1995)。

研究設計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九四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研究方法是內容分析法，而研究資料主要來自九四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在登記日提交給選舉事務委員會的中文政綱簡介。研究目的有三：（一）分析候選人所提出的政綱是否依地區和選區

的不同而異；（二）檢視當選者與落選者在政綱上是否存有某種關係；和（三）探討候選人政綱和得票率之間是否相互關連。

M.K. Lee (1993) 和 J.C.Y. Lee (1993) 都曾經運用內容分析法來研究一九九一年香港立法局選舉候選人的政綱，資料來源包括了政黨政綱、海報、傳單等。其特點在於多樣性，能多方面的大量蒐集有關的資料，缺點則是無法確定資料母體的完整性，從而潛在著樣本偏差的可能性。此外，資源雄厚、能多印放傳單和海報的候選人，其政綱在資料內佔的比例會相對偏高，也因此可能造成樣本誤差。本文沿用香港論壇 (1985) 的方法，以候選人於登記日提交給選舉事務委員會的政綱簡介，作為資料的最主要來源，這樣做的優點是研究母體的界定劃一。我們的基本態度是，儘管政綱簡介的內容可能十分簡略，但正是在這有限的空間中，候選人才會選擇刊載對他們最有利的資料，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政策訴求，和他們最希望選民知道的訊息。因此，政綱簡介不僅一方面能反映出候選人對地區內事務或問題的立場及看法，另一方面也可概括出候選人對有關立場及看法的深思熟慮的策略性取捨與安排。

九四年區議會選舉共有 757 位候選人。經過廣泛重覆的討論，757 份政綱簡介的內容被細分為 79 個小項目，¹⁰ 其中 16 項是候選人個人資料，63 項是候選人所提出的政見。¹¹ 除了少數個人資料項目（例如「年齡」、「服務本區時間」、「地區參與」等），編碼 (coding) 的標準取決於候選人是否提及某一項政策或社會問題（提及=1，未提及=0）。¹² 政綱簡介先經過獨立編碼，再從其中挑出八分之一 (N=94) 的候選人政綱以檢驗其「編碼者之間的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結果是，絕大部份項目的 Scott's P 值 (Scott, 1955) 都在 0.7 以上，少數信度不滿意的項目，也經過編碼者直接討論而盡量決定出共同能接受的編碼值。¹³

在確保資料的信度之後，有關政策方面的 62 個項目¹⁴ 依其性質和主題歸納成十三個政綱指標 (policy index)：交通、教育、福利、住屋、環境污染、治安、民生、民主、政治過渡、經濟、社區問題、選後承諾和個人特質。¹⁵

政綱指標的值為其所包含項目的總和。由於所有項目均為二分變項 (dichotomous variables)，政綱指標的最低值是零，最高值則是其包含項目的個數。相當程度上，政綱指標的建構彌補了二分變項項目無法反應強度的缺點。政綱指數愈高，表示候選人對該類型政策著墨愈多，重要性也愈大。

除了以內容分析法從政綱簡介中蒐集資料之外，鑑於候選人可能因為政綱簡介的空間所限或是競選策略，而刻意地不表明一些個人認為毋需說明或敏感的背景，本文亦從報章雜誌及選舉事務委員會所公佈的資料中，整理出候選人真正的政黨屬性，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包括是否任職港事／區事顧問），和候選人是否為現任議員（包括立法局、市政／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等三項有關資料。

政綱的選區差異性

香港雖然面積狹小，但各地區（香港島、九龍、新界）的差異性仍然存在，甚至同一地區內的各選區也可能因為人口特質、社區新舊、工／商／農業的集中、社會階層的區位

狀況、傳統勢力的分配等因素而面臨不同的問題。在種種客觀環境因素的影響下，候選人所提出的政綱和所注重的問題也可能迥異。表一整理出各選區候選人有關各類型政見（政綱指標）的百分比（頻度），從中可窺見政綱的選區差異性。

就整體香港而言，最多候選人提出的五個問題¹⁶ 依序是交通（64.2%）、福利（55.5%）、住屋（55.2%）、環境污染（53.2%）和治安（50.7%），最少候選人提出的問題則是經濟（7.0%）、政治過渡（11.4%）和社區問題（14.1%）。仔細研判資料可得知，在最受關注的五個問題中，除了福利一項之外，不僅均直接與選區內部的發展有關，而且更是在區議員職責工作所及的範圍之內。此外，福利政策問題雖然是全面性的，但卻明顯影響到選民個人的具體經濟利益。反之，最不受關注的問題大多是全面性和規範性較高、¹⁷ 與個人日常生活不直接發生關係的議題。就全部政綱指標的頻度排列來看，可以解釋，九四年區議會候選人大致上能在政綱中反映出是次選舉的地區性特質。整體而言，凡是與地區發展及個別內部問題的關聯性愈大的議題，愈受到候選人的重視。這政綱傾向與早期區議會選舉的情況十分相似，反映出在低層次選舉中，候選人因應選民的「理性需要」而作出的策略性政綱選擇的基本共性（Scott, 1985:13; Lau and Kuan, 1983:6）。

若比較各地區（香港島、九龍、新界）候選人政綱指標，大家所最關注的議題大致相同，但強調的順序和頻度的大小略有不同。香港島的候選人最關心「交通」、「環境污染」、「福利」和「民生」等問題，九龍是「住屋」、「環境污染」、「交通」和「福利」等，而新界地區則是「交

表一：各區議會選區候選人政綱頻度分析¹

政綱指標	香 ² 港	中 西 區	灣 仔 區	東 區	南 區	香 港 島	油 尖 旺 區	深 水 埗 區	九 龍 城 區	黃 大 仙 區
	(757)	(30)	(25)	(75)	(35)	(165)	(47)	(41)	(46)	(40)
交 通	64.2	83.3	68.0	57.3	82.9	69.1	72.3	29.3	82.6	42.5
福 利	55.5	60.0	64.0	50.7	68.6	58.2	51.1	34.1	65.2	60.0
住 屋	55.2	56.7	64.0	44.0	45.7	49.7	59.6	56.1	58.7	65.0
環境污染	53.2	86.7	76.0	45.3	57.1	60.0	74.5	53.7	71.7	37.5
治 安	50.7	43.3	48.0	44.0	48.6	45.5	68.1	48.8	50.0	42.5
民 生	48.7	70.0	68.0	45.3	57.1	55.8	55.3	48.8	67.4	27.5
個人特質	41.1	50.0	36.0	44.0	34.3	41.8	44.7	39.0	60.9	42.5
選後承諾	32.2	6.7	20.0	24.0	34.3	22.4	51.1	36.6	34.8	42.5
民 主	31.2	40.0	36.0	30.7	42.9	35.8	29.8	31.7	28.3	27.5
教 育	29.2	13.3	32.0	20.0	34.3	23.6	21.3	24.4	39.1	27.5
社區問題	14.1	6.7	16.0	8.0	8.6	9.1	21.3	4.9	4.3	15.0
政治過渡	11.4	23.3	16.0	9.3	25.7	16.4	10.6	12.2	13.0	7.5
經 濟	7.0	0.0	8.0	10.7	0.0	6.0	2.1	7.3	10.9	7.5

註：1. 資料依香港全區百分比的大小排列。

2. 包括香港島，九龍及新界。

括號（ ）內為各區候選人數。

觀 塘 區	九 龍	荃 灣 區	屯 門 區	元 朗 區	北 區	大 埔 區	西 貢 區	沙 田 區	葵 青 區	離 島 區	新 界
(65)	(239)	(29)	(49)	(42)	(24)	(40)	(26)	(71)	(58)	(14)	(353)
50.8	56.1	69.0	83.7	69.0	70.8	57.5	76.9	56.3	66.7	64.3	67.3
60.0	54.8	41.4	67.3	54.8	41.7	60.0	57.7	49.3	55.2	64.3	54.7
64.6	61.1	72.4	79.6	35.7	50.0	25.0	50.0	49.3	70.7	28.6	53.8
60.0	60.3	55.2	38.8	54.8	45.8	52.5	46.2	39.4	36.2	64.3	45.3
56.9	54.0	62.1	81.6	61.9	29.2	50.0	23.1	40.8	46.6	50.0	51.0
33.8	46.0	55.2	34.7	54.8	20.8	80.0	50.0	33.8	53.4	42.9	47.3
41.5	45.6	31.0	28.6	64.3	50.0	45.0	7.7	47.9	25.9	14.3	37.7
36.9	40.2	31.0	32.7	38.1	29.2	40.0	30.8	31.0	24.1	21.4	31.4
26.2	28.5	55.2	51.0	26.2	8.3	32.5	19.2	28.2	27.6	7.1	30.9
33.8	29.7	20.7	51.0	19.0	37.5	65.0	46.2	23.9	10.3	14.3	31.4
23.1	14.6	6.9	32.7	19.0	25.0	12.5	7.7	15.5	10.3	7.1	16.1
20.0	13.4	6.9	4.1	11.9	12.5	10.0	3.8	5.6	10.3	0.0	7.6
7.7	7.1	10.3	26.5	2.4	4.2	0.0	3.8	1.4	10.3	0.0	7.4

通」及「福利」兩項。眾所周知，「交通」問題是香港島和新界區一直以來難以解開的死結（前者是道路狹小，後者是離市區遙遠，幹線不足），較九龍區遠有過之，因此其成為該區候選人特別關注的對象，一點也不足為奇。另一方面，困擾香港島和九龍的「環境污染」問題在新界地區的重要性顯著下降，而人稠地窄的九龍所面臨的「住屋」問題在其他兩個地區的嚴重性相對減輕，也明顯是理所當然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九龍地區的候選人強調「選後承諾」的頻度（40.2%）比香港島（22.4%）和新界（31.4%）有顯著的差別，當中原因，可能是九龍地區現任議員候選人較多，對於挑戰者而言，除了彰現自己的政策立場之外，攻擊現任議員服務地區不力，強調自己的「選後承諾」應是宣傳的重點，以加強其在選民心目中的份量。¹⁸

如果把比較候選人政綱的單位縮小到選區這個層次，其間的差異就更為擴大了。基本上說，同地區內各選區候選人所提出的政綱仍然大同小異，但是當比較的對象包括了其他地區的選區，政綱的差別程度則十分明顯。依據表一的資料顯示，分項政綱指標頻率比較突出的選區¹⁹計有屯門的「交通」問題（83.7%）、南區的「福利」（68.6%）、屯門的「住屋」問題（79.6%）、中西區的「環境污染」（86.7%）、屯門的「治安」問題（81.6%）、大埔區的「民生」問題（80%）、元朗區的「個人特質」（64.3%）、油尖旺區的「選後承諾」（51.1%）、屯門的「民主」問題（51.0%）、大埔的「教育」問題（65%）、屯門的「社區問題」（32.7%）、觀塘區的「政治過渡」（20.0%）和屯門的「經濟」問題（26.5%）。另一方面，深水埗區的「交通」（29.3%）和「福利」問題（34.1%）、大埔的「住屋」問題

（25.0%）、葵青區的「環境污染」（36.2%）、西貢的「治安」（23.1%）、北區的「民生」問題（20.8%）、西貢的「個人特質」（7.7%）、中西區的「選後承諾」（6.7%）、離島的「民主」問題（7.1%）、葵青區的「教育」（10.3%）、九龍城區的「社區問題」（4.3%）、離島區的「政治過渡」（0%）、中西區、南區、大埔區和離島區的「經濟」（均是0%）等，都反映出該些地區的候選人對有關議題的策略性「忽視」。對於這些差異，並不容易一一解釋，但就個別的選區而言，某些議題相對重要或不重要的原因，還是有跡可尋的。例如，離島區並不重視「民主」，可能是由於傳統宗族力量仍強，現代民主意識較為薄弱之故。又例如，屯門區特別重視「治安」，多少由於此區的罪案率較其他地區一直較高有以致之。再例如，屯門區通往市區的屯門公路，由於中港之間的貨運近年激增，已使該公路陷於癱瘓之勢，其交通問題因此受到候選人高度重視，亦是不難想像的結果。

綜合言之，某項政綱指標頻度較高的選區，固然可以解釋為候選人提出的政綱大致雷同，但也凸顯了某項問題在該選區的重要性，候選人因為競選策略上的考慮而不得不提。而某項政綱指標頻度偏低的選區，則說明該問題在該區並不特別嚴重，候選人做選擇的空間比較大。無論如何，政綱的地區和選區差異性是明顯可見的。

政綱的選區差異性也可以從各選區內候選人提及各項政綱指標的平均數（強度）來比較分析。頻度指的是有多少候選人提出某項政綱，強度指的是平均每一位候選人就某項政綱提出了多少個相關的項目，亦可說前者標明廣度，後者代表深度。表二呈現各項政綱指標在各地區及選區的強度。

表二：各區議會選區候選人政綱強度分析¹

政綱指標	香 ² 港	中 西區	灣 仔區	東 區	南 區	香 港 島	油 尖 旺 區	深 水 埗 區	九 龍 城 區	黃 大 仙 區
	(757)	(30)	(25)	(75)	(35)	(165)	(47)	(41)	(46)	(40)
福 利	0.92	0.80	1.24	0.84	1.03	0.93	0.77	0.63	1.13	1.05
交 通	0.90***	1.53	0.96	0.83	1.23	1.06***	0.96	0.39	1.28	0.53
環境污染	0.77***	1.77	1.28	0.60	0.77	0.95***	1.21	0.76	1.13	0.45
住 屋	0.75**	0.80	0.88	0.53	0.60	0.65	0.74	0.83	0.87	0.90
治 安	0.65	0.47	0.56	0.56	0.57	0.55	0.94	0.78	0.63	0.55
民 生	0.55*	0.90	0.80	0.49	0.66	0.65**	0.64	0.54	0.74	0.30
民 主	0.50	0.40	0.48	0.49	0.63	0.50	0.57	0.59	0.37	0.28
個人特質	0.41	0.50	0.36	0.44	0.34	0.42	0.45	0.39	0.61	0.42
選後承諾	0.38***	0.07	0.20	0.29	0.34	0.25*	0.74	0.39	0.39	0.55
教 育	0.36	0.20	0.40	0.21	0.40	0.28	0.28	0.27	0.46	0.30
政治過渡	0.19***	0.43	0.32	0.20	0.37	0.30	0.17	0.17	0.30	0.15
社區問題	0.14*	0.07	0.16	0.08	0.09	0.09	0.21	0.05	0.04	0.15
經 濟	0.08	0.00	0.08	0.11	0.00	0.06*	0.06	0.07	0.13	0.08

註：1. 資料依香港全區平均數的大小排列。

2. 包括香港島、九龍及新界。

括號()內為各區候選人數。

*P ≤ 0.1; **P ≤ 0.05; ***P ≤ 0.01。

觀 塘 區	九 龍	荃 灣 區	屯 門 區	元 朗 區	北 區	大 埔 區	西 貢 區	沙 田 區	葵 青 區	離 島 區	新 界
(65)	(239)	(29)	(49)	(42)	(24)	(40)	(26)	(71)	(58)	(14)	(353)
1.05	0.94	0.62	1.04	0.95	0.50	1.05	0.96	0.89	0.79	1.29	0.89
0.66	0.77***	0.90	1.31	0.98	0.96	0.73	0.92	0.82	0.84	0.86	0.92*
0.91	0.91***	0.93	0.41	0.79	0.58	0.65	0.69	0.51	0.47	0.71	0.60**
0.97	0.87	1.00	1.00	0.48	0.79	0.28	0.65	0.63	1.00	0.29	0.71***
0.66	0.71	0.72	1.33	0.74	0.42	0.73	0.27	0.46	0.50	0.57	0.66***
0.38	0.51***	0.62	0.37	0.64	0.21	1.00	0.54	0.35	0.59	0.43	0.53***
0.42	0.44	0.86	1.00	0.52	0.13	0.32	0.27	0.52	0.50	0.07	0.53***
0.42	0.46	0.31	0.29	0.64	0.50	0.45	0.08	0.48	0.26	0.14	0.38***
0.37	0.48**	0.31	0.43	0.43	0.42	0.53	0.46	0.37	0.26	0.21	0.38
0.42	0.35	0.24	0.55	0.24	0.42	1.00	0.54	0.31	0.14	0.14	0.40***
0.31	0.23	0.10	0.06	0.17	0.17	0.10	0.04	0.10	0.17	0.00	0.11
0.23	0.15**	0.07	0.35	0.19	0.25	0.15	0.08	0.15	0.10	0.07	0.17**
0.08	0.08	0.10	0.27	0.05	0.04	0.00	0.04	0.01	0.12	0.00	0.08***

從全香港地區看，「交通」及「福利」兩項指標不但頻度最高而且強度也最大，平均每位候選人都提出一項有關於這兩個問題的政見（0.92 及 0.90）。除了「交通」和「福利」、「住屋」和「環境污染」在強度的先後次序互換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民主」一項的強度排名大幅提升。雖然僅有約三分之一的候選人提出有關民主的政見（見表一），但是他們針對這個問題著墨甚多，導致其平均強度的提高。t 檢驗的結果顯示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三個地區在「交通」、「環境污染」、「住屋」、「民生」、「選後承諾」、「政治過渡」和「社區問題」等指標的強度存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若比較各地區內選區政綱指標強度，則以新界的選區差異最大，共有十項指標強度出現統計上的顯著差異，香港和九龍各有五項。再就特定政綱指標在各選區的強度而言，大致上與其頻度的分析是一樣的，意即相對而言，愈多候選人提出的政綱，其強度也愈強。

落選者與當選者的政綱比較

政綱的提出除了標明候選人對其認定的選區所面臨問題的立場及看法之外，最主要是吸引選民以贏得選舉的勝利。Downs（1957）的空間模式（spatial model）強調，候選人必須採納最大多數選民所喜好的政策立場，其結果為候選人的政見趨於一致而無明顯的差距。但是這種說法忽略了政綱的內容是由候選人決定的，他／她可以在競選策略的考慮下，刻意的忽視與其他候選人立場一致的政見而選擇著重一些與眾不同的問題，或者是在大家都談論的議題上特意發揮，凸顯自己的不同之處。

香港論壇（1985:9）在研究八五年區議會候選人的政綱時指出，只有少數的政綱與選舉結果（獲勝／落選）和平均選票指數²⁰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近十年來香港社會的發展劇烈，各項社會問題油然而生。隨著區議會的全面開放直選，競選也趨於激烈。在眾多競爭者環伺的情況下，政綱的內容必須言之有物，確實地反映社會問題，以爭取選民。在相互比較之下，選民應傾向於不投票給僅提出空洞不實政綱的候選人。表三顯示各地區落選者和當選者各項政綱指標的強度平均數，並運用單因方差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來檢驗政綱與選舉結果的關係。

在全部候選人（N=707）當中，²¹落選者與當選者在十三項政綱指標中有七項有統計上的顯著差別，其中僅有「選後承諾」一項是負比關係，其餘六項都是當選者比落選者在強度上佔有優勢。在其他項目上，除了「福利」和「社區問題」之外，都是落選者比當選者來得有較多的強調。在統計上有顯著差異的項目中，當選者和落選者在與社區直接有關而又能有具體方案的政綱（「環境污染」、「住屋」、「民生」）上差別比較大，愈是全面性而且不著邊際的政綱（「民主」和「經濟」），則差別比較小。

整體而言，表三的資料顯示了由於客觀環境和選舉激烈程度的改變，九四年區議會選舉中政綱與選舉結果之間的關係，比八五年的區議會選舉更為密切。同時，理性投票行為也再次獲得證實，在八五年區議會選舉中，「不著邊際和缺乏具體方案……似乎都不獲選民青睞」（香港論壇，1985:9）的論點是在次選舉依然成立。另外，在頻度最高的六項政綱指標中（見表一），當選者和落選者在四項的強度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在其餘的七項中則僅有兩項。頻度與強度互相

表三：各區落選者與當選者政綱指標強度的單因方差分析

政 綱 指 標	香 港 ¹ (707)			香 港 島 (155)		
	落選者 (411)	當選者 (296)	自由度	落選者 (91)	當選者 (64)	自由度
福 利	0.922	0.929	705	0.857	1.063	153
交 通	0.856	0.976*	704	0.890	1.313***	153
環境污染	0.701	0.885***	705	0.791	1.266***	153
住 屋	0.689	0.855***	705	0.539	0.828***	153
治 安	0.657	0.635	705	0.539	0.531	153
民 生	0.504	0.635***	705	0.582	0.766*	153
民 主	0.492	0.534**	705	0.484	0.547	153
個人特質	0.421	0.389	705	0.429	0.391	153
選後承諾	0.409	0.314**	705	0.264	0.156	153
教 育	0.358	0.341	705	0.308	0.188	153
政治過渡	0.217	0.122	705	0.440	0.094***	153
社區問題	0.144	0.149	705	0.121	0.063	153
經 濟	0.056	0.112**	705	0.077	0.047	153

註：1. 包括香港島、九龍及新界。

括號()內為各區候選人數。

*P ≤ 0.1; **P ≤ 0.05; ***P ≤ 0.01。

九 龍 (219)			新 界 (333)		
落選者 (128)	當選者 (91)	自由度	落選者 (192)	當選者 (141)	自由度
0.961	0.912	217	0.927	0.879	331
0.844	0.714	217	0.849	0.993	330
0.945	0.857	217	0.495	0.731***	331
0.836	0.934	217	0.662	0.816*	331
0.820	0.539***	217	0.604	0.745	331
0.453	0.615*	217	0.500	0.589	331
0.461	0.484	217	0.516	0.560	331
0.484	0.429	217	0.375	0.362	331
0.531	0.363*	217	0.396	0.355	331
0.344	0.341	217	0.391	0.411	331
0.219	0.187	217	0.109	0.092	331
0.156	0.143	217	0.146	0.192	331
0.055	0.143*	217	0.047	0.121**	331

的關係顯示候選人的政綱乍看之下或許大同小異，但是愈能觀察入微，並多方面就議題提出自己立場的候選人，當選的機會愈大。

表三的資料也再次說明政綱的地區差異性。香港島的當選者與落選者在「交通」、「環境污染」、「住屋」、「民生」和「政治過渡」等指標上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九龍地區的當選者與落選者在「治安」、「民生」、「選後承諾」和「經濟」等指標上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而新界地區的當選者與落選者則在「環境污染」、「住屋」和「經濟」等指標上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此外，除了香港島的「政治過渡」和九龍的「治安」與「選後承諾」之外，各個地區的當選者在其他有顯著差異的指標強度都比落選者要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全體的候選人中，當選者與落選者在「民主」指標強度上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是這個情況在各個地區中卻消失了。這意味著儘管有關「民主」的政見在各個地區內對選舉的結果影響不大，但整個香港的政治大環境，還是瀰漫著希望能有更多民主的氣息，從而使民主成為大部份候選人不能迴避的規範性口號。

政綱與得票率的關係

本文的目的之一在於研究政綱與得票率之間的關係。作為依變項的得票率，與前節所述的獲勝／落敗在概念上不盡相同。在選區內獲得最高得票率（候選人票數除以該區總票數）者固然當選，但是其得票率與其他選區獲勝者的得票率總是有所差異的。除了政綱之外，影響得票率的高低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包括：（一）選區候選人數；（二）現任議

員（incumbency）²²；（三）候選人政黨背景；²³和（四）中國因素（China factor）。²⁴前三項是一般影響民主選舉候選人得票率較為重要、也具有相當廣泛經驗基礎的因素（Parker, 1985; Gant and Luttbeg, 1991），而最後一項則是香港的政治環境所獨有的、但也有一定的實證支持的現象（劉兆佳，1993；Leung，1993）。因此，本文用以解釋九四年區議會候選人得票率的迴歸分析模型（regression model），特別將上述四個因素和將十三項政綱指標一併列入。由於自變項的數目共有十七項，為了迴歸分析中簡明的原則，我們採用按步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的方法，以找出最佳的解釋組合。表四展現了迴歸分析在各地區和選區所得到的結果。

迴歸模型可以解釋全部香港地區候選人得票率變化的三分之一左右（ $R^2 = 0.34$ ）。分析模型包括了三個政綱指標（「政治過渡」、「住屋」、「民生」）和三個非政綱性的自變項（「候選人數」、「現任議員」、「中國因素」）。

平均而言，凡多增加一名競爭者，候選人的得票率滑落差不多 10 個百分點（ $b = -0.104$ ）。這結果可以說不證自明，因為候選人的增多，自然無可避免地會拖低所有候選人的得票率。

其次，具有現任議員身份的候選人，可以比其他候選人的得票率平均高出 17 個百分點（ $b = 0.170$ ）。現任議員的知名度、過往工作成績，以及在地區內建立的網絡等因素，都有助加強其在競選時的優勢。事實上，過去的區議會選舉亦證明了這一點。例如，Lau 和 Kuan（1985:26-27）便發現，在一九八五年的區議會選舉中，現任議員的成功率是 74.2%，

而非現任議員的成功率則只有 38.8%，兩者相差近一倍之遙。

最後，「中國因素」的操作性定義²⁵可能說明了其與得票率之間的正比關係（ $b = 0.049$ ），因為中國政府在聘請港事／區事顧問時，也會考慮其社會地位及地區代表性。

另一方面，三項政綱指標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在二到三個百分點，²⁶ 其中「政治過渡」與得票率之間是負比關係。較可能的解釋是，平穩過渡九七在近年來已是耳熟能詳的議題，候選人對此一問題著墨太多，導致討論其他項目的空間減少，反而會造成負面的影響。至於「住屋」與「民生」，便是一般香港市民必須具體面對的日常生活課題了。總的來說，政綱指標對於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雖然有限，但是當候選人其他因素難分軒輊的情況下，二到三個百分點的差異便可能直接影響選舉的結果。

在各地區方面，迴歸模型的解釋能力約在三成（香港島， $R^2 = 0.34$ ；新界， $R^2 = 0.31$ ）到四成（九龍， $R^2 = 0.40$ ）之間，「候選人數」和「現任議員」仍然是最重要的兩項自變項。政綱指標中只有「政治過渡」（ $b = -0.040$ ）和「環境污染」（ $b = 0.028$ ）在香港島地區對候選人得票率有統計上的顯著的影響，而新界地區僅有「環境污染」（ $b = 0.029$ ），九龍地區則沒有一個政綱指標是對該區候選人得票率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九龍也是唯一的一個地區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對其得票率有統計上顯著的正比影響（ $b = 0.05$ ），這或許與其中深水埗及黃大仙兩個選區多年來均有政黨苦心經營的情況有關。

就各個選區而言，迴歸分析的結果大致上可以歸納為三點。第一，非政綱性的自變項對各選區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

比政綱指標來的重要，其中尤以「候選人數」和「現任議員」兩項最為突出。比較特殊的是中西區、灣仔區、觀塘區和離島區等四個選區，其候選人得票率和「候選人數」和「現任議員」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而「中國因素」僅在灣仔區有非常鉅大的影響力（ $b = 0.23$ ），意即凡該區具有中國政府委任之港事／區事顧問身份的候選人，平均而言可以多得近23%的得票率，這結果應與灣仔區本身的特殊社區結構有關：此區為一老區，公共屋邨極少，亦非新興中產階級的聚居地，傳統「親中」的街坊福利團體十分活躍，從而使其他政治勢力（特別是政黨）較難立足。最後，政黨背景則僅對深水埗（ $b = 0.19$ ）、黃大仙（ $b = 0.12$ ）和荃灣（ $b = 0.12$ ）三個選區的候選人有益。這三個地區一直以來均是公共屋邨的主要結集要點，也是許多政黨（前身大多為壓力團體）發源的地方。

第二，僅有少數的政綱在全部 18 個選區中的 11 個選區²⁷與候選人得票率有統計上明顯的關係。雖然如此，這些政綱在這 11 個選區內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多在十個百分點左右，²⁸ 而且在這 11 個選區內，迴歸分析模型的解釋力（迴歸平方和）比其他選區都顯著為高。²⁹ 從這兩個方面來看，政綱指標的強度對候選人得票率的影響不可謂不重要了。

第三，沒有任何一個選區的得票率是和「交通」、「民主」或是「經濟」等政綱指標有統計上顯著的關係。表四所呈現的 10 個政綱指標中，「住屋」、「民生」、「環境污染」和「福利」等項在特定選區內與得票率成正比關係，其餘的均呈現出反比的關係。這些正反比關係基本上符合前一節所討論的各地區當選者和落選者在政綱指標上的差異關係。

深水埗區	九龍城區	黃大仙區	觀塘區	九龍	荃灣區	屯門區	元朗區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0.076 (-0.256)	-0.112 (-.531)	-0.149 (-0.420)		-0.100 (-0.506)	-0.149 (-0.420)	-0.156 (-0.431)	-0.129 (-0.458)
0.137 (0.299)	0.100 (0.358)			0.104 (0.274)			
0.191 (0.440)		0.124 (0.356)		0.047 (0.134)	0.124 (0.356)		
	0.071 (0.297)	0.131 (0.380)			0.131 (0.380)		
-0.125 (-0.303)							
	-0.041 (-0.240)						
						-0.070 (-0.282)	
0.501	0.640	0.688		0.615	0.688	0.836	0.746
0.516 (0.000)	0.621 (0.000)	0.530 (0.000)		0.399 (0.000)	0.530 (0.000)	0.289 (0.005)	0.192 (0.005)

表四：各區議會選區候選人得票率的按步迴歸分析（續）

北 區	大 埔 區	西 貢 區	沙 田 區	葵 青 區	離 島 區	新 界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B)
-0.172 (-0.458)			-0.108 (-0.505)	-0.122 (-0.360)		-0.115 (-0.415)
	0.279 (0.606)	0.472 (0.799)	0.174 (0.349)	0.114 (0.239)		0.137 (0.300)
				-0.094 (-0.241)		
		0.125 (0.573)				0.029 (0.109)
		-0.107 (-0.419)				
	-0.067 (-0.297)					
0.847 (0.03)	0.393 (0.000)	0.307 (0.000)	0.658 (0.000)	0.714 (0.001)		0.657 (0.000)
0.209 (0.03)	0.556 (0.000)	0.785 (0.000)	0.395 (0.000)	0.288 (0.001)		0.311 (0.000)

綜合討論

區議會在本質上是香港政治體系中地區性的基層諮詢機構，區議員的工作應以服務選區選民，就地方上的事務向政府反映意見。九四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在提出的政綱中基本上都反應了區議會的地方性特質。無論是從政綱指標的頻度或強度來看，凡是與地區或選區發展或是其內部所面臨特別問題關係愈大的議題，愈是受到候選人的重視；反之，若是全面整體性或含有規範性意味的問題則較不受到候選人的青睞。由於每一個地區或是選區在經濟、人口結構和社區發展等都有所差異，所面臨的問題和選區選民的訴求自然不同。候選人唯有強調選區關注的政策才能吸引選民，這形成了候選人政綱在地區和選區的差異性。其中又有不同的層次，資料顯示，地區之間或是同一地區的選區之間政綱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然而，如果比較的分析單位愈大（如地區）或同質性愈大（如同一地區內的選區），候選人政綱差異性就愈大。

政綱的頻度和強度代表著不一樣的概念。頻度意含著候選人對選區內議題的共識程度，強度則顯示個別候選人對特定議題的重視程度。比較九四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政綱的頻度和強度發現，二者之間展示強烈的正比關係，也就是愈是大家公認的選區問題，其被個別候選人重視的程度也愈高。這個現象或可解釋為候選人政綱雷同，了無新意。但是在競爭激烈的選舉中，若不注重其他候選人都提出的選區議題，只會顯示出該候選人對地方事務漠不關心。故此，從競選策略看，對一些人人都關心的地區議題，聰明的候選人不但要提，而且要提得比其他候選人更多、更深入、更有技巧。

這種在民主政治中候選人為贏取選票的競爭現象（bidding），也可以在比較當選者和落選者在政綱指標強度的資料中得到證明。在全部或各地區的單因方差分析中，當選者不但在多項政綱指標的強度上比落選者來得顯著的高，而且這種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頻度大的指標中更為明顯。這意味著能在政綱上花費心思，以求政見訴求廣且深的候選人贏得選舉的機會比較高。但是，候選人在選擇政見的時候需要謹慎，因為囿於區議會本身工作性質和範圍的限制，過於側重華而不實或陳義過高的政見，不見得會取得選區選民的認同或受落；相反，只有那些能針對地方性問題而提出具體可行方案的政見，才能幫助候選人贏得勝利。這個現象也再次說明了產生政綱地區或選區差異性的原因。

候選人的得票率受到選區候選人數和是否具有現任議員身份這兩項因素極大的影響。現任議員在知名度、工作表現和地方經營等方面的優勢固然是耳熟能詳，但是在某些選區，這種優勢很容易因為參選人數的增加或是政綱設計上的不經心而轉逆。尤有甚者，這兩項因素並非是候選人所能控制的，有心者或許可以避免硬撼現任議員，但是在確認現任議員的優勢而毅然參選者，多關注一些社區內發生的問題可以略為抵銷現任議員的競選優勢。就這一點而言，政綱指標對於得票率的影響，相對於「候選人數」或「現任議員」或許是輕微的，但在其他因素均等的情況下，這輕微的影響卻可能決定了選舉的結果。

瞭解影響候選人得票率的因素並不等同於知道候選人如何能夠在特定的選區當選，而本文採用的以候選人為主體的資料和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結論，也不能直接用來解釋甚至預測選民是如何投票的。本文分析架構所隱含的假設

是，選民個人的投票行為是對候選人競選策略的理性回應。如果這個假設是可以成立的，本文研究結果或許可以間接為香港選民投票行為提供一些註腳。

影響議會選舉的因素大致上可以歸納為「現任議員」、「政黨屬性」、「政策取向」和「候選人評價」。就香港整體而言，比較迴歸分析模型的迴歸權數（見表四）的結果，各項因素對得票率的影響程度依次為「現任議員」（ $B = 0.252$ ）、「政策取向」——當中包括「政治過渡」（ $B = -0.089$ ）、「住屋」（ $B = 0.074$ ）和「民生」（ $B = 0.064$ ），而「政黨屬性」及「候選人評價」（以「個人特質」為相應的變項）則不在模型之中。這個觀察結果亦可間接說明選民投票時的取舍標準。迴歸分析也驗證了本文的一些基本假設。第一，由於政綱的「引爆作用」，九四年區議會候選人成功的將選民對候選人的個人評價轉移到政綱內容上面，對於候選人在個人特質上的訴求和政黨屬性無所反應。第二，「現任議員」在得票率上的優勢支持了回溯性政策投票取向的論點，選民對於過往工作表現的評估重於對於未來承諾的期待心理。另外，當選者與落選者在地方性及能有具體方案一類的政綱指標上有非常顯著的差異，這類的政策對於選民在政治上熟悉程度的需求亦是最低的，因為選民可以直接在生活環境中親身感受到這些問題的存在。

結論

「政策取向」投票在投票行為研究中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此項研究的分析架構以及所驗證的基本假設應該原則

上適用於分析探討香港其他層次的選舉，但是具體有關九四年區議會選舉的一些細微觀察（例如特定政見在特定選區的影響力），是否能運用在即將舉行的立法局選舉，則仍然有待驗證。由於選舉層次的提昇和選區的擴大，候選人所應該注重強調的政策自然會有所不同。無論如何，選舉既是選民與候選人之間的理性互動過程，在其他條件或機會均等的情況下，候選人要贏得選民認同，對選民的「理性需要」的瞭解、掌握和針對這些需要而作出的政策安排，便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輕心不得。當然，政綱畢竟只是整個選舉過程的其中之一個組成部份，其他環節特別是將政綱傳送給選民的各種競選技術（包括「洗樓」、「海報張貼」、「組織動員」、「街頭訪問」等），也會直接影響了選舉結果和得票率。簡言之，政綱與競選技術是不可分割的，特別在選區細、選民少但住所集中的香港區議會選舉，種種與選民直接或間接的溝通對於選戰的影響，仍需要嚴謹的學術研究繼續深入探討。

註釋

1. 有關近年香港各政治勢力（特別是「民主派」和「親中派」）的發展與變化，可參閱關信基（1995）的〈香港政治勢力的重組〉一文。
2.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筆者在選舉前（1994年9月10日到12日）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65%的受訪者無法指出任何一個香港現有的政黨或政治團體是他們所信任的。該項民意調查經由電話成功的訪問了911位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

3. 候選人刻意淡化甚至隱藏其政黨背景，還可能受到「中國因素」所影響，特別是對於民主黨的候選人而言，因為中國政府對民主黨一直採取排拒否定的態度，認為它是一個「抗中亂華」的政黨（王家英，1995：11）。
4. 見註釋1。
5. 該項民意調查也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與筆者合作，在1994年9月23日到26日之間，成功的電話訪問了1,012位十八歲或以上的香港市民。
6. 此處絕非刻意忽視「候選人形象」或「個人特質」對選民投票行為的影響力，「候選人政綱」和「候選人評價」二者之間交互影響的關係，將在文獻探討一節中闡述。
7. 詳見「九四年區議會選舉」一節中的論述。另外請參考雷競璇、尹寶珊（1995），Louie（1993）。
8. 一九八五年區議會民意調查，見香港論壇（1985：7）的綜合整理。
9. 另請參考「九四年區議會選舉」一節中所引用的另兩項民意調查，所得到的結論都指出「候選人政綱」的重要性。
10. 筆者特別感謝連鵬博士、沈國祥先生和黃少健先生多次的參與討論，並提出具體的建議。
11. 詳見附錄。其中「其他」一項屬於剩餘項（residual item），凡是不能列入其他78項的資料全部歸於此項。
12. 此一編號方式不同於香港論壇（1985）以字數來反映候選人對某一項政策的重視程度，主要原因在於其中可能包括了與政策或問題本身毫無相關的連接字、虛詞或形容詞，形成重視性的膨脹。
13. 筆者特別感謝沈國祥先生和黃少健先生在整個編碼過程中所付出的時間和心血。
14. 「其他」項目除外。

15. 各個政綱指標所包含的項目，詳見附錄。
16. 除了頻度排列順序之外，50% 亦為決定最受關注議題的標準。比例的選定是根據地區愈大、異質性愈高、則共識的比例應相對的降低。反之在比較各地區（香港島、九龍、新界）時以 55% 為準，在比較各選區時則以 60% 為準。
17. 「社區問題」屬於此類，候選人主要是強調來自基層，與選區選民認同，或是呼籲加強社區歸屬感等規範性的政見。
18. 香港島、九龍、新界三個地區的現任議員候選百份比分別是 30.9%、34.7% 和 29.2%，以九龍最高。
19. 選區選擇的方法是橫向比較該政綱指標在每一選區的頻度，因此，頻度的高低是相對而言，並非絕對性的。
20. 候選人平均選票指數是以候選人得票除以候選人的應得平均票數（選區總票數除以選區候選人數）。
21. 「自動當選者」不在分析範圍之內。
22. 現任議員包括現任的立法局、市政／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議員。有關現任議員身份在立法機構選舉的影響，詳見 Parker (1985) 中前四章。
23. 此處「候選人政黨背景」指的是候選人實際的政黨屬性，而非他們在政綱簡介上所主動登記的記錄。
24. 有關中國因素對香港選舉的影響，見鄭宇碩和雷競璇 (1995:83-110; 227-266)，本文中「中國因素」的操作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是指候選人是否有擔任中方的港事或區事顧問的身份。
25. 見註釋 23。
26. 「政治過渡」 ($b = -0.029$)、「住屋」 ($b = 0.017$)、「民生」 ($b = 0.020$)。
27. 這 11 個選區包括中西區、灣仔區、南區、深水埗、九龍城、黃大仙、荃灣、屯門、大埔、西貢和葵青區。

28. 大多數政綱指標的迴歸係數都在 0.07 以上，僅有九龍城區的「治安」問題的迴歸係數是低於 0.07 ($b = -0.04$)。
29. 迴歸模型在這 11 個選區的迴歸平方和多在 0.467 (南區) 到 0.785 (西貢區) 之間，但不包括屯門 ($R^2 = 0.289$) 和葵青 ($R^2 = 0.288$)。其他選區 (除了觀塘和離島區之外) 的迴歸模型之解釋能力則在 0.192 (元朗區) 到 0.458 (油尖旺區) 之間。

參考文獻

- 〈政黨政治第一次面臨考驗〉，《快報》，1994 年 8 月 1 日。
- 〈政黨效應初試啼聲〉，《經濟日報》，1994 年 8 月 4 日。
- 〈區會之非雞肋，政黨大試牛刀〉，《經濟日報》，1994 年 8 月 2 日，第 19 頁。
- 〈區議會戰雲〉，《香港聯合報》，1994 年 9 月 14 日，第 3 頁。
- 王家英 (1995)，〈宏觀結構因素下的微觀選擇——香港九四區議會直選政治行動初探〉，《亞洲研究》，第十二期，頁 2-17。
- 香港論壇 (1985)，《八五年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政綱及政治心態調查報告》，香港：香港論壇。
- 張炳良 (1989)，〈地方行政模式——一個政治結構性的分析〉，鄭宇碩編，《過渡期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頁 38-66。
- 雷競璇，尹寶珊 (1995) 〈香港選民投票行為研究的發展〉，鄭宇碩，雷競璇編，《香港政治與選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127-158。

- 劉兆佳 (1993), 《過渡期香港政治》, 香港: 廣角鏡出版有限公司。
- 鄭宇碩, 雷競璇編 (1995) 《香港政治與選舉》,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 鄭宇碩 (1995), 〈香港社會的價值與態度〉, 鄭宇碩, 雷競璇編, 《香港政治與選舉》, 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頁 1-33。
- 鍾庭耀, 〈年青選民能否善用投票權?〉, 《明報》, 1994 年 6 月 24 日, 第 39 頁。
- 關信基 (1995), 〈香港政治勢力的重組〉, 朱雲漢等著, 《一九九七前夕的香港政經形勢與台港關係》, 台北: 業強出版社, 頁 71-90。
- Asher, Herbert B. (1983). "Voting Behavior Research in The 1980s: An Examination of Some Old and New Problem Areas", in Ada W. Finifter, ed.,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pp. 339-388.
- Born, Richard (1986). "Strategic Politicians and Unresponsive Vote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599-612.
- Brody, Richard A. and Benjamin I. Page (1972). "Comment: The Assessment of Policy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450-458.
- Campbell, Angus et al.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Campbell, Angus et al.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Carmines, Edward G. and James A. Stimson (1980). "The Two Faces of Issue Vot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4:78-91.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 Fiorina, Morris P. (1980).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ant, Michael M. and Norman R. Luttbeg (1991). *American Electoral Behavior*. Ithaca: F.F. Peacock Publishers.
- Goldberg, Authur S. (1966). "Discerning a Causal Pattern Among Data in Voting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913-22.
- Green, Donald P. and Ian Shapiro (1994).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artwig et al. (1980). "Variability in Electoral Behavior: The 1960, 1968 and 1976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553-558.
- Jackson, John E. (1975). "Issues, Party Choices and Presidential Vo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161-185.
- Jacobs, Lawrence R. and Robert Y. Shapiro (1994). "Issues, Candidate Image and Priming: The Use of Private Polls in Kennedy's 1960 Presidential Campaig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527-540.
- Jacobson, Gary C. and Samuel Kernell (1983). *Strategy and Choice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ssel, John H. (1980). *Presidential Campaign Politics: Coalition Strategies and Citizen Response*.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 Krosnick, Jon and Donald Kinder (1990). "Altering the Foundations of Support for the President Through Priming",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4:497-512.

- Kwok, Rowena Y.F. and Elaine Chan (1992). "Issue Voting: Policy Positions and Voting Inclinations", in Rowena Y.F. Kwok, Joan Y.H. Leung and Ian Scott, eds., *Votes Without Power: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199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79-98.
-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1983). *The District Board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 (1985). *The 1985 District Board Election in Hong Kong: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a Dependent Polity*.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Lee, Ming-kwan (1993). "Issue-Positions in the 1991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Lau Siu-kai and Louie Kin-sheun, eds.,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p. 237-248.
- Lee, Jane C.Y. (1993). "Campaigning Themes of the Candidates in the 1991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n Lau Siu-kai and Louie Kin-sheun, eds.,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p. 297-315.
- Leung, Sai-wing (1993).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1991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The June 4th Incident and Anti-Communist China Syndrome", in Lau Siu-kai and Louie Kin-sheun, eds.,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p. 187-235.
- Louie, Kin-sheun (1993). "The 'Party-Identification' Factor in The 1991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 in Lau Siu-kai and Louie Kin-sheun, eds., *Hong Kong Tried Democracy: The 1991*

- Election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pp. 157-185.
- Markus, Gregory B. and Philip E. Converse (1979). "A Dynamic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of Electoral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1055-1070.
- Miller, Arthur H. et al. (1986). "Schematic Assessments of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521-540.
- Miners, Norman (1991).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 5th edn.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e, Norman H. et al. (1976).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iemi, Richard G. and Herbert F. Weisberg, eds. (1984). *Controversies in Voting Behavior*, 2nd edn.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 Page, Benjamin I. and Calvin C. Jones (1979). "Reciprocal Effects of Policy References, Party Loyalties and The Vo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3:1071-1089.
- Parker, Glenn R., ed. (1985). *Studies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 Przeworski, Adam (1991).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ahn et al. (1994).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Variations in Political Candidate Appraisa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8:193-199.
- Rabinowitz, George et al. (1982). "Salience as A Factor in The Impact of Issues on Candidate Evalu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44:41-63.

- Scott, Janet L. (1985). *Local-Level Election Behavior in an Urban Area*.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ocial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Scott, W.A. (1955). "Reliability of Content Analysis: The Case of Nominal Scale Cod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321-325.
- Whiteley, Paul F. (1988). "The Caus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Issues, Candidate Evaluations,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Vote Choice -- The View From 'Rolling Thunder'", *Journal of Politics*, 50(4):961-984.
- Wright, Gerald C., Jr. and Michael B. Berkman (1986). "Candidates and Policy in United States Senate Elec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567-588.
- Yeung, Fred (1992). "Voting Criteria: Ideal and Actual Choices in Candidate Selection", in Rowena Y.F. Kwok, Joan Y.H. Leung and Ian Scott, eds., *Votes Without Power: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199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99-123.

附錄

(甲) 個人資料變項

年齡	社會／政界人物支持
性別	地區參與
教育程度	現任區議員
職業	現任市政／區域市政局議員
宗教	中方聯繫（區願、港願、預委）
本區出生	勳銜
服務本區時間	公共服務／諮詢委員會（官方）
政黨背景	公共服務／諮詢委員會（非官方）

(乙) 政綱項目

1. 交通	
交通問題（一般性）	車位不足
塞車	公共交通工具服務（包括收費）
改善道路／行人天橋	
2. 教育	
教育問題（一般性）	增加學校社工
增加中小學學位	加強公民教育
托兒服務	加強家庭倫理道德
3. 福利	
醫療問題（一般性）	傷殘
老人福利（醫療／老人金）	青少年福利（青少年中心）
退休金	

4. 住屋

房屋問題（一般性）

大廈管理

租金

樓價

重建／徙置／賠償

5. 環境污染

污染問題（一般性）

噪音問題

水質污染

空氣污染

綠化環境

衛生

6. 治安

治安問題（一般性）

色情問題

青少年犯罪

毒品

黑社會問題

強姦及風化案

小販

7. 民生

民生問題（一般性）

文娛康樂活動

公共地方安全問題

露宿者問題

8. 民主

推動民主

維持法治

維護自由

推動人權

推動男女平等／婦女權益

9. 政治過渡

維持經濟繁榮

維持安定／平穩過渡

推廣基本法

推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加強中港溝通（政治上）

加強中港聯繫（經濟上）

紮根香港

10. 經濟

勞工權益

提倡低稅率政策

壓抑通脹

消費者權益

11. 社區問題

階級認同（例：來自基層、草根）

加強地區歸屬感

12. 選後承諾

設立議員熱線／諮詢服務

設立議員服務處

增加家訪

加強官民溝通／反映民意

提高區議會地位

13. 個人特質

強調個人特質（性格、作風）

Platform and Election

A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1994 District Board Election in Hong Kong

Milan Tung-wen Sun
Timothy Ka-ying Wong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ssue voting is less important than party identification and candidate evaluation.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issue voting and voter's cognitive limitations, recent studies emphasize that candidates are strategic politicians who use well-designed campaign platforms to integrate the individual's policy positions and personal image to provide a limited basis for the voters to evaluate and compare candidates. Using data generated from candidate platforms of the 1994 Hong Kong District Board Elec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that candidate platforms not only varied among constituencies and areas but also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elected and defeated candidates. Holding constant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in a district" and "incumbency," the study also finds that carefully selected and designed candidate platform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ercentage of votes received.